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美]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著
耿建新 宋兴无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X171.1
F-763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美]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著

耿建新 宋兴无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 (美) 福斯特 (Foster, J. B) 著; 耿建新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7

(当代学术思潮)

书名原文: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ISBN 7—5327—4024—2

I. 生... II. ①福... ②耿... III. 生态环境-政治学

IV. ①D0-05 ②X1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7378 号

图字: 09—2004—706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责任编辑 张吉人

装帧设计 张志全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美]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著

耿建新 宋兴无 译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yiwen.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mm 1/16

印 张 11.25

插 面 2

字 数 150 000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7—4024—2/B·247

定 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727956

内容简介

谁才是地球生态真正的敌人？现代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人类固有的本性和道德水准？还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为此，本书直接进入当代生态政治学领域，对环境污染、可持续发展、人口增长、土地肥力、原始森林保护等诸多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同时，对资本主义世界在1992—2001年间，应对环境危机的主流经济措施进行了集中的批判，以此展现了作者独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作者简介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的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有：《脆弱的星球》(1994, 1999)、《马克思的生态学》(2000)、《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2)。

“西方学者看西方”总序

东西方的接触，如果从中国丝绸进入罗马帝国显贵的生活算起，已有约两千年的历史。中国人认真看待西方人，并加以研究和学习的历史至少也有150年了，改革开放以来，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流和交往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和理解还有明显的玫瑰色，存在着某些认识误区。鉴于此，我国广大读者迫切需要一套理性地看待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客观准确地描述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丛书。

对于上述问题的共同理解，使在加拿大和美国的两位博士（一位社会学博士，一位历史学博士；一位中国人，一位加拿大人）走到了一起，并决心为改变这一状况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计划在第一阶段以组织翻译西方现有学术著作为主，重点使广大读者对西方社会政治文化有一个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挑选作品的标准是：1. 对西方现存问题有直接认知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学术著作；2. 讨论中国读者误区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的学术著作；3. 篇幅不大，但在西方学界有一定影响的最新学术著作。根据这几条标准，第一批出版的书目包括：埃伦·伍德的《资本的帝国》，乔治·里茨尔的《虚无的全球化》，约翰·福斯特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和乔姆斯基的《霸权还是生存》。

著名左翼理论家伍德自己认为，她这部篇幅为七章的论著既是对当前形势的政治回应，也是从总体上对资本帝国主义所作的分析性、历史性探索，包括从资本帝国主义产生以来，是什么“推动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发展”，是什么“使资本帝国主义区别于其他形式帝国主义”等

问题。

因其学术著作(《社会的麦当劳化》)成为畅销书而著名的社会学家里茨尔对自己这本新书的评价是:本书在几个方面是建立在原有著作基础之上,但为了努力开辟一条研究全球化的新途径,又远远超越了它们。本书不仅把“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地化”明确区分开来,而且将两者与两个论题——实在与虚无——联系起来。

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中直接介入到当代政治经济领域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环境的争论,对上世纪最后十年间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环境危机采取的经济措施进行了系统批判,深刻分析和阐释了诸如资本主义与生态相悖的本质原因、生态与人类自由的辩证关系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等重大问题。

乔姆斯基是英语语言学界的泰斗,但近二十年来,他在西方世界却以抨击西方媒体、政治和政府更为著名,因此《霸权还是生存》一书封套上称他是,“尚有争议的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在这里,乔姆斯基对美国的全球霸权进行了剖析,指出美国的单边主义、退出国际协议、国家恐怖主义和太空军事化与其谋求全球统治的动机是一致的。

在选择著作和实施翻译的过程中,许多西方学者,包括被选著作的作者和由于种种原因著作不能入选的作者都给予了我们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或为我们的中文版作序,或在百忙中为我们出谋划策,推荐优秀著作,或亲自为我们修改序言。上海译文出版社独具慧眼,大力支持我们的选题,并加快出版步伐,使丛书的第一批译著以最快的速度面世,在此,我们向他们和所有支持、帮助这一工作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选择书目和翻译过程中,我们的学术水平和认知能力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尽管我们本着对社会负责,对读者负责的认真态度,竭力做好,但不足乃至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业内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宋兴无

前 言

本书的论点是，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这种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实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这种观点与以往将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主要归咎于人类固有的本性、现代性、工业主义或经济发展本身的认识不同，它以真凭实据说明人类完全有望在克服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的同时，继续保持着人类的进步。但条件是，只有我们愿意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才有可能与环境保持一种更具持续性的关系。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章节原本是独立成篇的论文，主要是1992至2001年间，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应对环境危机的主流经济措施进行的一系列批判。写作这本书的同时，我也在进行着《脆弱的星球：环境经济简史》（1994，1999）和《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这两本书的调研和写作。但三本书的内容不仅鲜有重复，反而倒是互为补充的。《脆弱的星球》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前资本主义社会到今天生态环境恶化的简明历史画卷。《马克思的生态学》则是一项异常艰难的工作的开始：即挖掘对自然和生态危机的唯物主义认识，这本书一直写到了达尔文和马克思逝世的1882至1883年（目前我正在写接下来的一卷）。《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与上述两本书不同，它不再作单一的历史性描述，而是试图直接介入当代政治经济领域对资本主义和环境的争论，并在这一过程中触及到斑点鹑、出口有害废料和全球变暖等具体问题。

自然，我要十分感谢我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感谢那些在我写作另

外两本生态书籍时给予我支持的人们，对于他们我始终心怀感激。他们是保罗·伯克特、卡洛斯·卡斯特罗、布雷特·克拉克、迈克尔·道森、迈克尔·德莱林、巴巴拉·爱泼斯坦、丹尼尔·费伯、查克·亨特、约翰·杰米尔、维基·拉森、弗雷德·马格道夫(其中一篇论文与我合著)、哈里·马格道夫、鲍勃·麦克切斯尼、戴维·米尔顿、克劳德·米苏基维茨、贾森·莫尔、安德鲁·纳什、詹姆斯·奥康纳、艾拉·夏皮罗、约翰·西蒙、保罗·斯威齐、维克多·沃利斯和迈克尔·耶茨。也感谢我的家人比尔·福斯特、劳拉·塔姆金、索尔·福斯特和艾达·福斯特，是他们使我对生活不断有所发现并产生新的灵感。

谨以《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献给保罗·斯威齐和哈里·马格道夫，他们坚信，今天的历史虽然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意志，但却是人类斗争的结果。

目录

前言/1

第一章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1

第二章 生态盈亏底线的专制：经济简化论的环境与社会后果/18

第三章 全球生态与公益/36

第四章 生态与人类自由/44

第五章 “让他们吃下污染”：资本主义与世界环境/53

第六章 生态危机的规模/62

第七章 可持续发展什么？ /73

第八章 全球化与居所的生态道德/77

第九章 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技术能解决问题吗？ /86

第十章 无阶级倾向的环保主义的局限性：西北太平洋沿岸原始森林斗争的教训/97

第十一章 马尔萨斯《人口论》发表 200 周年纪念/130

第十二章 李比希、马克思和土地肥力损耗：关乎当今农业/149

译后记/167

第一章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1963年蕾切尔·卡逊在谈论“环境污染”问题时，对20世纪后期人们不愿接受生态理论的完整含义与维多利亚时期抵触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了一番很仔细的比较：

回首历史，我发现了一个十分相似的情景。请诸位回想一下查尔斯·达尔文在发表进化论之后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人类起源于先前生存的生物这一观点，被当时社会愤怒地拒绝了，而这种拒绝不仅来自对科学一无所知的公众，而且也来自与达尔文同在科学领域工作的同行们。许多年之后，《物种起源》所阐述的观点才得以确立。如今，知识界已很少有人会否认生物进化的事实了。然而我们当中却有许多人拒不承认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即：影响着与人类具有进化渊源的成千上万物种的环境，也同样在影响着人类。（Lost Woods: The Discovered Writing of Rachel Carson, pp. 244—5）

有许多原因可以说明这种普遍否认人类生态基础的重要性。许多人将此归结为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缺陷，它发源于“支配大自然”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大自然的存在就是要服务于人类并成为人类的奴仆。但为什么现代社会要拒绝承认人类也需依附于自然，则很大程度上还要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主义逻辑中寻找答案。这种制度把以资

本的形式积累财富视为社会的最高目的。

众所周知,传统经济学自命是有效利用稀有物品的科学。但这里所说的物品仅狭隘地界定为市场商品。发展经济所造成的生态资源匮乏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恶化(在人类生存的时限内)则不在正统经济学的考虑范围。在绝少顾及所谓“外部”或“社会”成本这一点上,它与该理论蓄意为其辩护的制度是一脉相承的。

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家们通常将生态问题视为某种尽力回避而不是应该严肃对待的问题。在关于“增长的极限”的著名大辩论期间,经济增长理论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74年5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撰文写道:“如果其他东西可以轻而易举地替代自然资源的话,那么原则上就真的‘没有什么问题’了。世界就可以不需要自然资源,资源枯竭也只不过是一个事件,而不是什么灾难。”

索洛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当时的那番话不过是假设,并没有说这种近乎完美的可替代性就是事实,或者认为自然资源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但是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他进而论述道,这种替代性如今已达到了很高程度,生态预言家们对世界末日的担忧完全是杞人忧天。虽然价格系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瑕疵,使其未能计算出环境成本,但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激励的手段加以解决,只要对于这种激励手段的形成,政府尽量少介入。

然而使索洛这些传统经济学家大为恼火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喧嚣后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首次提出增长限度的问题时,其论点竟是建立在同样的数学预测模式上,即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的增长趋势指数。但这里的焦点是在有限环境中对需求的增长指数,而不是经济扩张的神奇魔力。即使“增长有限”理论家们的预测还有许多问题,但它至少强调了一个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家极易忽视的事实,那就是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而在全球资本主义和全球环境之间形成了潜在的灾难性的冲突。

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

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

一如资本主义注重毫无节制的经济扩张一样，它投资的短期行为也值得关注。资本的拥有者在评估投资前景时，总是计算在预计的时间内(通常在很短时期内)得以回收投资以及今后长久的利润回报。诚然，在采矿、油井和其他自然资源领域里的投资商通常也会考虑较长期的利益。显然选择这些投资领域的主要动机是为生产某种最终产品获得稳定的原材料供应，从长远的角度看，其回报率也是极其可观的。但即便是在上述领域投资，其回报周期也不会超过 10 到 15 年，这同生态保护至少需要 50 至 100 年(甚至更多)相比差距很大。

至于那些对人类社会具有最直接影响的环境条件和因素，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则需要更长远的总体规划，诸如水资源及其分配、清洁水源、不可再生资源的分配与保护、废物处理、人口影响以及与工业项目选址相关的特殊环境要求等。所有这些都提出了可持续性的问题，也就是几代人之间生存环境的均衡问题，这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资本需要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回收，并且确保要有足够的利润抵消风险，并证明好于其他投资机会。

实力雄厚的投资商需要关注股票市场，它是资本扩张的源泉，也是企业重组兼并的助推器。股份公司期望维持股东权益的价值并能定期分派红利，公司高层主管获得财富的渠道，相当一部分就取决于他们所持股票市场价格的增值。而且公司高层主管获得的巨额红利，不仅得益于公司利润的增长，而且也常常得益于公司股票市值的增加。长远的规划与波动的股票市场是毫不相干的，股票市场上的所谓价值前景，是指近年来的盈利率、亏损率，或是今后的利润率。即便是前景看好投入到新经济的大量资金，暂时可以忽视公司亏损，也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报偿。投机商们为从股市或风险投资中获得丰厚回报，也许能耐着性子等候一两年，但公司业绩如果连续亏损，这种耐心将很快蒸发。

除了可以将公司盈余用于再投资外，公司还通过长期债券融资。为此，他们必须投入足够的钱来支付利息并为偿付债券而预留出资金。

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资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整体环境的致命因素。控制某些有害污染物的排放(通常采用管道出口控制方式)对人的生活几乎可以产生直接的正面影响。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需要考虑几代人以后的需要。大量为促进可持续发展而制定的长期环保政策不得不与第三世界相关联，因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源于富裕国家的资本需要最迅速的回报，通常在一两年之后就要收回原始投资。在这些领域决定投资决策的回报周期也同在其他领域一样，并不是什么“善良”投资商愿意为社会和后代放弃利润追求或是“丑恶”投资商唯利是图的问题，而是这一体制的本质使然。即便是那些着眼长远的行业早晚也必须满足投资人、股东和银行的利益。

以上提及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待环境的种种弊端，在当今我们通常称之为“环境危机”的领域里是显而易见的。“环境危机”囊括了以下形形色色的问题：全球变暖、臭氧层遭到破坏、热带雨林消失、珊瑚礁死亡、过度捕捞、物种灭绝、遗传多样性减少、环境与食物毒性增加、沙漠化、水资源日趋短缺、洁净水不足以及放射性污染等不胜枚举。这一长长的清单还在继续，而且影响范围也在日益扩大。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生态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仅局限于列举一些具体的生态问题还不能说明问题，比如多数人认为最紧迫的全球性生态问题是全球变暖。这是由于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在大气层内积聚热量而产生的“温室效应”。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已形成科学共识，那就是如果不遏制全球变暖的趋势，本世纪内将会导致全球性的生态与社会灾难。但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特别是在解决化学燃料排放问题方面成效甚微。

是什么阻止了解决问题的必要行动？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只需看一看资本积累过程在签署《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中是如何具体设置障碍的，就一目了然了。而《京都议定书》正是国际社会为减

缓和遏制全球变暖趋势所作的重要努力。

《京都议定书》的失败

国际社会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所作的努力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这些试图达成一个气候协议的早期努力导致了 1992 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公约内包括各签署国自愿制定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未能完成减排指标的国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谈判,最终导致 1997 年《京都议定书》的出台。《京都议定书》首次从“法律”上确定从 2008 至 2012 年,所有工业化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必须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少 5.2%。按照协议,欧盟要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少 8%,美国减少 7%,日本减少 6%。按照先前在气候谈判中达成的协议(称为“柏林授权” Berlin Mandate),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虽然也是协议签署国,但在初级阶段不承担减排义务。

随后关于实施《京都议定书》1997—2001 年度指标所进行的谈判,主要聚焦在两个棘手问题上:排放许可的交易条款,允许有些国家从不需要减排的国家购买减排指标,以达到减排标准,以及“碳汇”(Carbon Sinks)津贴,对森林和农田提供排放信贷。欧盟对两项建议均持反对意见,认为这不过是试图掩饰不愿履行减排义务而已。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两项措施则持赞同意见。2000 年 11 月在海牙举行的谈判破裂,因为双方都不愿让步。2001 年 3 月问题仍悬而未决,加之没有任何重要工业国家批准协议,布什政府宣布《京都议定书》存在“致命缺陷”,决定单方退出气候协议。

然而,旨在为通过《京都议定书》铺平道路而设计的谈判于 2001 年 7 月在波恩重新启动。要使协议生效,签署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达到世界总量的 55%,这就意味着如果美国不加入,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必须加入。在这种情况下,欧盟被迫在谈判中一点一点地让

步，最终还是接受了美国（与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起）最初在海牙提出的建议。

虽说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京都议定书》在波恩得以通过，但由于减排指标与实际背离，《京都议定书》已被抨击得千疮百孔。农田和森林被视为具有碳汇的作用，所以可以得到排放的信贷，其效果是那些被认为已履行“减排”的国家只要其森林植被茁壮成长就可以了。协议还允许污染排放许可指标的交易，使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自1990年以来已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可以向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购买排放许可指标。俄罗斯因前苏联的解体，现存工业体系自1990年以来温室气体排放锐减。对未能达到减排指标的国家，惟一的惩罚也不过是在第二轮制定标准时给该国多加几个百分点。此外，要求未达指标的国家对破坏气候行为进行补偿的建议未被采纳。其中对日本的一个重要让步是，原协议具有“法律约束”一词被删除，用合其心意的“政治约束”取而代之。这样，《京都议定书》原本区别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最核心的东西——设立减排的法律约束，便被如此抛弃了。

单美国一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就占世界总量的1/4，作为气候公约的签署国，它拒不接受在波恩达成的协议，可以说是《京都议定书》最令人瞩目的失败。2001年6月11日，乔治·布什总统发表了一篇演讲，再次重申他的政府在3月份所采取的强硬态度，绝不重返《京都议定书》。这样一来，他就更加明确了美国政府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就已十分明确的立场——面对美国汽车工业集团的反对，所有试图让美国通过气候协议的行为都是枉然（这也意味着在美国参议院中没有一人支持通过协议）。

何以促使布什于2001年6月重申美国反对气候协议的立场，从他处置来自声望极高的国家科学院(NAS)的一份报告的方式上就一目了然了。布什政府最初认为有必要对气候变化做进一步的研究，并责成国家科学院调查气候科学的研究现状（具体指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政府间

协作小组(IPCC)的研究成果),并向政府提出了一份报告。

布什政府为寻找科学依据,证明其阻止全球变暖的国际协议毫无根据的主张具有某种合理性,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他在给国家科学院的回复中写道:“本届政府正在审查美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我们需要科学院在气候变化的科学领域提供帮助以确定在哪些方面已获得了最大确定性,哪些方面还存在着最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就政府间协作小组的研究报告及其概要之间有何实质性区别,希望倾听你们的意见,回复为盼。”

布什政府就是这样来责成国家科学院来确定政府间协作小组是否得出了某些政治性的结论。研究报告均由顶级气候科学家撰写,他们从事的科学根本不屑做这类政治性结论。或更糟的是,就像全球气候联盟(GCC)(为反对《京都议定书》的企业进行游说的主要组织)所一贯声称的那样,政治已玷污了科学。

就在布什 2001 年 6 月 11 日发表演讲的前几天,国家科学院已向总统提交了一份题为《气候变化科学:若干关键问题分析》的报告。报告坚定地确认了联合国政府间协作小组在数份研究报告中已明确的观点:人类活动使全球变暖是现实,并对生物圈的稳定性和我们所了解的地球上的生命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对此,国家科学院的报告以毋庸置疑的口气开门见山地宣称:

由于人类的活动,温室气体在地球的大气层中累积,致使表面空气温度和海洋水下温度上升。事实上温度一直在上升。从以往数十年的观测数据看,这些变化很可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其中相当一部分也是自然变异的反映。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暖,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海平面上升将持续整个 21 世纪。计算机模拟和基础物理推导已得出这种变化将产生的副作用,其中包括降雨频率的增加和半干旱地区彻底干旱的可能性增加。这些变化的影响程度将主要取决于气候变暖的程度和发生的频率。